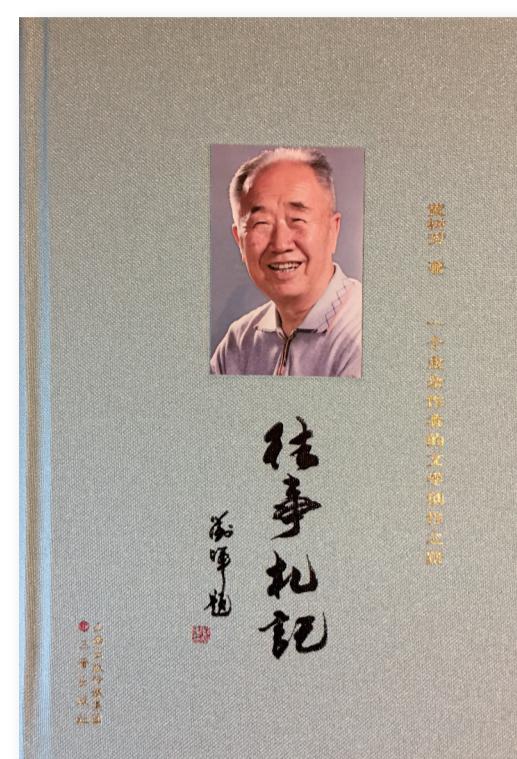


重点  
阅读

黄树芳《往事札记》——

## 满树芳华情未尽

□刘庆邦



通读黄树芳的新著《往事札记》，敬佩之余，我想来想去，想用两句话来概括我的阅读感受：满树芳华情未尽，且看黄花晚节香。

回忆起来，我和黄树芳相识已经30多年了。1983年夏天，煤炭工业部在大同矿务局安排开展了一个中学生夏令营活动，活动由副部长张超带队，参加活动的除了北京的几十名中学生，还邀请了萧军、姜师白、许麟庐、柳倩、韩少华、陈建功等诸多作家、画家和书法家，与大同的作者交流。那是《中国煤炭报》正式创办的第一年，我作为报社副刊部的记者，有幸参加了活动的全过程。当时黄树芳是矿务局宣传部的部长，也是夏令营组委会的负责人之一，处处可见他忙碌的身影。有人告诉我，别看黄树芳忙前忙后，一点儿架子没有，他也是一位作家呀。噢，作家，那厉害！我当时也在悄悄写小说，对当作家比较向往，对作家这个词也比较敏感，一听便记住了黄树芳的名字。之后，黄树芳从大同调到新开发的平朔煤矿，我多次到平朔去拜访他。遇到什么困难，也愿意请他帮忙。1997年夏天，我和妻子带着王安忆夫妇、刘恒一家，奔黄树芳而去，与平朔的作者座谈，彼此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更让我终生难以忘怀并心怀感恩的是，黄树芳为我母亲安排的海滨之旅。2002年春节期间，得了重病做过手术的母亲向我提了一个要求，想看看大海。母亲很少开口向她的儿子提什么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很可能是母亲一生最后的心愿，我不能不慎重对待。可我知道，冬天尚未过去，处在旅游淡季的一些海边的疗养院、度假村之类还在放假，我带母亲去看海住在哪里呢？我第一个想到了黄树芳，他跟我说过，他们单位在南戴河建有一座疗养院，离海很近，出门就可以看海。于是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了我母亲的心愿。他马上爽快答应，说没有问题，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你只管带母亲去吧，我一定安排好。这年春节过后，在黄树芳的关心帮助下，我带母亲到南戴河看了大海。第二年春节过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如果说看大海是我母亲一生中的一个梦想的话，是黄树芳帮我母亲圆了这个梦。

我听见有人把黄树芳叫黄主席，我叫不出来，我觉得这样叫显得有些生分。我见有人在文章里把黄树芳称为黄树芳先生，这样的称谓尊重是尊重了，只是觉得不够亲切，至少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我自己没有哥，每次见到黄树芳，我都想叫他一声大哥。叫大哥会显得突兀，我只好叫他树芳兄。是的，多少年来，不管是见面，还是在电话里，我都是叫他树芳兄。江湖上称兄道弟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这兄不是那兄，树芳兄真是一位人品完美、人格高尚的好兄长啊！

不仅我有这样的看法，在全国煤矿的作家队伍里，乃至在全国文坛，只要一提到黄树芳，大家都会说，那可是一个好人哪。这样的评价或许有些笼统，有些平常，不那么响亮，但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特别是作为一个作家，能得到这样众口一词的评价，并非易事。它需要以善良的天性为基础，还要以后天的长期写作、持续修为和不断完善自我为支持。也就是说，一个人要赢得有口皆碑的好口碑，有善良的天性还不够，“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还需要通过持之以恒的虚心学习，刻苦实践，以守住自己的天性，并使之得到升华。黄树芳60年的创作生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每一篇作品，也诠释着做人与做人、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和道理。

人类世界由两方面组成，一是物质世界，二是精

个话题，请他理解时，他不仅原谅了同事，还表示说，他确实很崇拜赵树理，在创作中受到赵树理不少影响。黄树芳曾遇到过一个领导，因他不在领导的大学同学圈子里，人家就排挤他，使他的工作遇到不少困难，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却迟迟没有拿出来发表。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想法，就把文章压下了。

无数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人长期处于写作状态，其心态与别人会有所不同。特别是一个正在写作的人，他的心不在现实世界，而是沉浸在自己所想象和创造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超越现实的心灵世界。在心灵世界里，他的心应该是静远之心、仁爱之心、感恩之心、温柔之心，他的情绪会随着作品中人物的欣喜而欣喜，忧伤而忧伤。同时，他会增强生命意识，提前看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以及尽头的身后事，这样他的境界就不一样了。所谓看淡、看开、看破尘世中的一切，无非就是这样的境界。有了这样的境界，他不但不会悲观、厌世，而是会更加珍爱生命，珍爱人生。稍稍具体一点说吧，当一个作者正写得满眼泪水的时候，心里正爱意绵绵、温存无边的时候，不管他看见一朵花还是一棵草、一块云还是一只鸟，都会觉得那么美好，那么可爱。这时候如遇到一些事情，他的反应可能会慢一些，因为还没能从自己的小说情景里走出来。他看待事情的目光还是文学的目光，情感的目光，善待一切的目光。至少，他不会着急，更不会发火。黄树芳就是这样。他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他所在单位有一位女干部，工作能力强，英语过硬，颇得中外职工赞赏。后来她与丈夫离婚了，找了一个老外，这件事在职工中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一天，她到干部处找到黄树芳，要求出国探亲。若换了别人，或许会对女干部进行一番诘问，不会顺利答应她的要求。而黄树芳意识到，女干部的选择，也许隐含着一些新的价值取向和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他还想到，这位女干部也许会成为他的写作对象。于是，他对女干部让座让水，还跟人家聊了一会儿，让工作人员为女干部办好了手续。女干部忐忑而来，满意而去。

不知道朋友们对黄树芳的微笑没有，反正我是注意到了。几十年来，只要我一想到黄树芳，脑子里浮现的就是他微笑的样子。他笑得眼睛弯弯，眼睑眯起，像传说中的弥勒的微笑。他的微笑真诚、谦和，是经常性的，几乎成了他形象的一个标志。谓予不信，请看此书封面上黄树芳的照片就知道了。

一个作家，不管他写作的时间有多长，写来写去，只能是写自己。不管他塑造了多少个人物，归根结底，塑造的也是他自己。文学的本质是劝善的，是改善人心和人性的，希望人生和社会都变得更美好一些。而要做到这些，正人先正己，正己先正心，自己首先必须是一个善良的人，并不断提升自己的善良，做到善始善终。在这方面，已是耄耋之年的黄树芳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回头再说说我在开头所说的两句话，第一句是我苦思冥想起来的，第二句是借用宋代诗人韩琦的咏菊诗。两句话的用意是明显的，这里就不再解释了。在新书《往事札记》首发之际，谨向树芳兄一鞠，表达我深深的敬意。

(《往事札记——一个业余作者的文学创作之路》，黄树芳著，三晋出版社出版)

## ■新知新思

在出版界热衷于推出年度文学选本的背景下，对中国当代不同时期的各类文学选本进行考察和研究，梳理选本编者的编选模式和审美标准，厘清其参与意识形态建构和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方式和脉络，显得十分必要，也是颇具前沿价值的选题。作为对当前文学选本热的一种回应，青年学者徐勇学术新著《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是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选本的考察研究，论著选取文学思潮、文学资源、文学场等多个维度，探究选本编纂作为一种无声的批评，与其时文学生产之关联及其参与意识形态建构的途径与方式。

这部论著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互证视野中选本编撰研究的史学线索。它不仅指社会史、政治史，还包括文学史、选本史。而研究者经常会以某个选本为个案来考察某个文学时期选家的编选标准及其价值与缺失，但可能很少关注到选本本身的研究，缺少对中国文学选本的历史脉络的整体性认识。而徐勇的选本研究正是从中国选本源流上进行考察，并发现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使选本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选本的编纂突出“选”的功能，是现代性的产物，而非以“保存”为主的古代选本传统的简单延续。就现代性的时间观而言，两个时间段前后构成否定关系。这就内在地决定了选本编撰处一种时间张力之中：作品发表时间与选本编撰时间，以及同一类选本在不同时代之间的张力。比如，《生命如同那年夏天——伤痕小说》(1992年版)的编纂就基于这种现代性的考量。“伤痕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失去轰动效应而被边缘化，在“伤痕文学”逐渐失去合法性、文学研究“向内转”的文学年代，再次对之进行编选就意味着重估它的文学史价值，而非文学价值。又如，《1956年短篇小说选》《1957年短篇小说选》与1979年出版的《重放的鲜花》，尽管两者均对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编选，但不同时代的文学趣味所决定的编选标准的差异性，致使二度编选的作品有明显不同。徐勇的论述贯通了这种时间差中的选本演变史，建构起一个具有历史纵深感的选本研究模式。

在当代文学选本史的框架内，徐勇截取80年代各类文学选本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究选本编撰与80年代文学生产机制的种种关联。若要阐述两者关联，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去把握80年代时代特征的复杂性。徐勇深知，选家编选意图、编选标准与文学生产的时代语境是息息相关的。他抓住了新时期之初乍暖还寒的文学气候的暧昧性——一种新旧杂陈的过渡性。此时，“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彼此共存，交织互渗，深刻影响着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研究者以这种游移不定的文学背景为参照，在翔实的史料考证的基础上去分析并探讨选本编撰参与意识形态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事实上，无论哪种选本都很难做到对文学作出纯客观意义上的编排与呈现，而只能是福柯意义上的“文献”，蕴含某种意识形态内涵和审美评价。从这个角度看，任何选本实际上都代表一种批评之声，属于文学批评的特殊形态。基于何种立场和视角对某类作品进行分类和筛选，这其中其实就暗含了编选者的审美标准和编选意图，无形中对读者构成某种导向性指引。以李陀、冯骥才编选的《当代短篇小说43篇》(1985年版)为例，这个选本以1979年初至1983年春之间的小说为入选对象，而此时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盛行，现实主义文学依然是主流，但选家却以现实主义为其编选原则，而恰是通过所选作品的某种倾向性，流露出对现实主义文学主流的不满和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呼唤。由此，徐勇认为“选本的出版，其实是一种既成事实和对事实的创造性想象与叙述的合成功”。然而，一如批评家的写作，必然受到他所处的时代氛围的影响，编选者的主体性当然也是有限度的，它拘囿于时代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对此，徐勇怀有清醒的意识。他没有盲目夸大地家的个体性因素，而忽略由于时代因素及文学格局变动所引起的在编选标准上的某种趋同现

象。就张颐武主编的《全球华语小说大系》10卷与陈思和主编的《新世纪小说大系(2001—2010)》来看，编选者都意识到纸质媒体和新媒体争宠、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竞逐的发展格局，于是将以往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的科幻、青春、官场、穿越等网络文学和通俗文学通纳入编选范围。在对同一时期文学作品的筛选上所表现出的标准趋同现象，是编选者之间基于特定时代文学话语特征所形成的精神共振。

就选本类别而言，年选体现了社会及其文学秩序的大体情况，争鸣作品选体现了思想解放的开放程度，但两类选本的编纂所指涉的并非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思潮流派选本的编纂则直接指向文学本身及其批评范式。这种分类比较的研究模式颇能体现研究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并以它特有的逻辑性和学理性，推断出选本编纂与80年代文学生态之间，实际上是彼此建构和互相生产的关系。由此，选本编撰的演变既体现了文学与时代、社会思潮之间的对话关系，又显示出政治作用于文学并以文学的方式显现其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

在选本研究范式上，徐勇的探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可以说，这部论著为选本编纂研究打开了一个极具潜能的学术空间，为我们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也将推动学界对90年代乃至新世纪文学选本的关注和研讨。

(《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徐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另一种批评

□王迅

## ■开卷絮语

## 逆光之美

□王德恒

诗儿。此时产生先回舅舅家寻根探祖后再谈婚论嫁的想法，顺理成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第一道门户，就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东干人，在与中国的商贸活动中获益匪浅。因此，年轻人渴望有机会到中国直接学习母语，认识母亲(舅舅)家的文化。

这正是《丝路情缘》产生的土壤，从这种土壤中诞生出来的雅诗儿，就是时代中的典型人物。

伊万对雅诗儿的求婚虽然遭到拒绝，但他对雅诗儿的爱却丝毫未减，也令人感动。伊万为雅诗儿买好机票，在因故停机后，他决定不惜斥巨资组成一支“陕西村东岸子娃”雅诗儿回老家省亲寻根的车队，邀请了对舅舅家有浓厚兴致的人一起前往西安。

这才是全书精彩的开始。

以前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丝路”总是从西安开始，一直向西，奔日落而行。此时，人们是在中国境外的丝路上向丝路的发源地逆向而行，这就很有意思了。由此也可以看到，伊万确实将对雅诗儿的爱扩展到她的文化寻根之中，从而让读者对此行充满美好的期待。一路上他们之间作为情侣也是大秀恩爱的，两种爱情观念在一处处景色和历史典故碰撞迭出。

他们到李白的诞生地凭吊情感有差异，又从那里出发，一步一个台阶，故事随行，在阿拉木图奔向冼星海大街时，矛盾初始。随后，从点到线，深入挖掘和体察，时代与文



化次第展开，矛盾焦点不断变化。但读到这里的时候，读者还以为雅诗儿和伊万的爱情会在一路上加深，终止于圆满。雅诗儿坚强地固守东方习俗，伊万会谅解。

后来，雅诗儿因一场小事故昏迷住院。醒来后，守候着她的是医务人员，她突然间感到，就是你再疲劳，而此时酣睡不在，也实在说不过去。从此他们之间的变化或曰隔阂，造成文化冲突的深化。最终，伊万和雅诗儿没有走到一起，我们突然地感到了凄凉和沉重。

进入中国，伊万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贸易中，还全权委托雅诗儿进行中哈之间的第一次文化贸易。此时，这对恋人虽然已经分手了，却被赋予了一种朦胧之美。当传来伊万和康雅洁——雅诗儿的老师喜结连理的消息时，雅诗儿送上的真是真诚的祝福。她的感情安放在西安，令人感到十分圆融。

(《丝路情缘》，巴陵峰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 以神话观照现实生活

□姜建政

妙地把不夜城的故址胶东、尤以威海地区为代表的民俗进行了画龙点睛式的铺陈，让人物亲自讲述和实践民族民间风俗，生动再现了民俗产生的背景、蕴含的对民众生活的美好祝福和期盼，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民族智慧的博大精深。三位作者都是土生土长的胶东人，他们怀着对家乡的浓浓情意，从对历史和现实的审视中，发掘和梳理当地流行或即将消失的民俗故事，激活蕴含在生命里的文化基因。从民俗学角度看，该作品可谓一部胶东民俗的风景画，也是文学对民族基因的传承。

《不夜·女娲后传》以善恶对立为背景，彰显了中华民族惩恶扬善的价值观。回顾五千年历史，天地之道是生民之道，中华民族一直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乾坤之道中披坚执锐，破浪前行。在这部小说中，女娲拯救黎民于水火的正义一方和破坏百姓生活的反动邪恶一方斗智斗勇，波诡云谲，演绎了一场场天地间善恶水火不容相容的较量大戏。最终，女娲娘娘的大爱，成为光照天地、恒久永存的民族之魂，让所有的神界、仙界和凡人都被感化。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界成为人间的保护神，以八仙为代表的仙界为建设人间福地——不夜城而各显神通，这种美好的祈愿不就是中华民族理想之愿景的原始雏形吗？

中华文化是我们灵魂的家园。重温中华文化无穷魅力，有助于民族文学获得崭新动力，也是民族文化振兴的根基所在。虽然人类的进化早已进入科技主导的时代，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面对史前文明和神话世界时，那种心灵的敬畏是相似的，也是不可磨灭的。中华文化符号和血脉让中国人在文化基因中刻下了历久弥新的印记，长篇神话小说《不夜·女娲后传》，正是对自信自强自立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可贵诠释。

《不夜·女娲后传》，刘方计、安立、王春波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 书香荐座

## 以神话观照现实生活

神话是人类童年的不老记忆，是民族精神的活化历史。借助上古神话，文学家的想象力可以扩及无限大的空间和无限远的时间。当代的神话小说，多以网络小说中的玄幻小说为代表。尽管神话小说的人物是传说中的，但是其观照的生活现象却是现实人生的。因此，真正的神话小说从来不是为文学而文学的，而是现实生活景深式的反映。长篇神话小说《不夜·女娲后传》就是一部借助神话传说的体例和价值取向，审视和观照胶东民俗，诠释与民间乐、爱民忧民、天地至德的现实性小说，该作品不是以神话传说的演绎为主旨，而是以关注和关心民生为目标，因此具有阔大的现代视角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不夜·女娲后传》以造福民生为理想，重塑女娲爱在人间的圣母形象，让中华文化焕发出新的光彩。女娲是中华文明的始祖，尽管女娲的题材以及中华神话的诸多故事在一些经典文学作品里得到传承和演绎，在当代玄幻小说里也被屡屡运用，但是真正能够从文化哲学和文化自觉的高度来激活女娲等富含民族精神基因的神话人物，在当代文学领域是相当不够的。珍视和挖掘古老神话蕴含的民族基因是文学不可缺少的重要使命，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举措。《不夜·女娲后传》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尝试。三位作者以这部颇具民族文化情怀的作品，讲述了女娲关注和关心民生的大爱故事，塑造了女娲的最新形象，让停留于创世阶段的女娲走下神界、成为造福民间的人类之母，神话本身的民族性和精神性得以彰显。

《不夜·女娲后传》以农耕文明为蓝本，阐释胶东地区二十四节气民俗，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作者巧